

斯诺辗转访问延安

□ 刘 晖



斯诺对陕北的访问，直接给他提供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题材，这本书被西方媒体誉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那么，斯诺最初为何想要访问陕北呢？这与宋庆龄有密切关系。

访问陕北的动机

少年时期，埃德加·斯诺就听到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故事，这给他留下了关于这个东方国度的一些印象。1928年，斯诺经夏威夷、日本等地来到上海，在《密勒氏评论报》任助理编辑，后又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上海的特约通讯员。

1931年9月，斯诺在上海多次拜会宋庆龄，被她的伟大人格所感染，两人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经宋庆龄介绍，斯诺结识了鲁迅等人。在鲁迅的帮助下，斯诺编辑完成英文版的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成为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1933年秋，斯诺离开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执教。在此期间，他与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进步分子保持密切往来，从学生那里得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在斯诺看来，“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红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他们“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

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新闻记者特有的新闻敏感和问题意识，让斯诺产生了数十个疑问。“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斯诺由此萌生了到陕北红区访问的念头，想亲眼看一看蒋介石试图要“清剿”的究竟是什么人。

1936年春，斯诺又去拜访宋庆龄，表达了这一愿望，宋庆龄表示赞同并愿意提供帮助。时隔不久，宋庆龄接到有关人士转来的中共中央电报，内容是请宋庆龄帮助邀请一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医生到陕北访问。经宋庆龄介绍，斯诺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开始酝酿访问陕北红区的相关事宜。

踏上“探险”之旅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性一年，西北地区的政治局势趋于缓和，这为斯诺进入陕北红区提供了操作的空间。斯诺“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在南京国民政府严酷的高压政策之下，去红区“确实是有危险的”，这一点斯诺非常清楚：“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在这种冒险精神的驱使下，6月的一个午夜，斯诺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性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登上了从北平驶往西安的火车，开始了“探险”之旅。

出发时，斯诺感到身上不太舒服，可心里却非常兴奋。之所以兴奋，是因为“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是到“红色中国”去。之所以“有点不舒服”，是因为斯诺听到

西北地区流行天花、霍乱等疾病的传言，“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

火车沿京汉铁路一路南行到达郑州，然后换乘沿陇海铁路西行的列车。火车在河南和陕西的景象奇异、层层重叠的黄土山中缓慢爬行，抵达西安火车站。到西安府后，斯诺拜访了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邵力子证实了斯诺之前所得到的消息：东北军已秘密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共识，“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此，如果安排适当，到前线去是可能的。不过，蒋介石控制着在西安的蓝衣社宪兵，还在继续搜捕共产党员，到处是特务，“空气极度紧张”。

斯诺要与陕北方面取得联系，除了介绍信，就“只有一个希望”：在约定的旅馆住下来，等候一位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可谓“一无所知”。几天后，一位身材高大，“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走进房间，用英语跟斯诺打招呼。这位王先生的真实姓名叫董健吾，他成功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在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建立了秘密联系通道。

7月初，在董健吾的安排下，斯诺乘坐东北军的军用卡车，由西安经宗蒲县到洛川、延安，然后步行到前线。跟随斯诺的是在延安雇来的一个骡夫，把“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途中，斯诺历经“白匪”追逐的险境，几经周折，终于在7月9日到达红军前哨司令部所在地安塞。

中国红色区域的大门向一位外国记者打开，这让斯诺感到惊奇和怀疑，但事实很快就使他相信了中国共产党人给他自由活动的诚意。

“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

在安塞，一位蓄着浓密黑胡子、面目清瘦的青年“军官”接待了斯诺。这位“军官”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令斯诺倍感意外，他就是周恩

来——“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斯诺完全没有想到，刚刚来到这个“神秘”之地，就受到热情接待，兴奋得彻夜未眠。

斯诺在安塞住了两天，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三天，周恩来派人骑马护送他前往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斯诺在这里受到隆重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员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同群众一起，迎接斯诺的到来。群众打出的欢迎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7月13日晚，毛泽东礼节性看望斯诺，用力同他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7月14日，保安举行欢迎斯诺和马海德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即席讲话，对客人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7月15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向一位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7月16日晚9时至次日凌晨2时，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强调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此后，毛泽东多次同斯诺长谈，阐述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回答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第一次公开表达独立自主立场，畅谈联合战线、红军长征等问题。

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到中国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位西方新闻记者。他近距离观察中共领导人、士兵、农民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撰写并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以第一手资料报道了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世界发出红星闪耀的信号。

这本书也是今天“讲好中国故事”的绝佳范本。
（摘自2024年1月4日《人民政协报》）



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毛泽东旧居

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茅坪村谢氏慎公祠后面，有座砖土结构的两层建筑。它就是毛泽东居住过的地方——八角楼。1927年，毛泽东来到茅坪后，八角楼主人谢氏一家将八角楼楼上的房间腾给毛泽东居住。因房屋顶部的天窗为八角形，得名“八角楼”。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翻山越岭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次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参加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2月上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主力到达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师，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力量。

我党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令国民党反动势力心生恐惧，因而对根据地频繁进行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生活条件愈发艰苦，一些日常生活所需极度匮乏。为此，毛泽东号召根据地全体军民厉行勤俭节约，甚至对点灯用油作出详细规定，其中团、营、连部每个办公室晚上办公时，每盏灯可以点3根灯芯，办公完要及时熄灭。根据规定，毛泽东晚上办公可以点3根灯芯，但他为了节省用油，每次只点1根灯芯。一天深夜，八角楼的警卫员发现楼上的房间十分昏暗，于是往油灯里添了1根灯芯。毛泽东回到房间后发现油灯变亮，便将新添的灯芯拨开，继续在昏暗的油灯下奋笔疾书。

除油盐短缺外，粮食、棉花、布匹、药品等物资也很稀缺。冬天的井冈山上非常寒冷，战士们没有棉衣和棉被，只有两件单衣和薄薄的粗线毯。毛泽东和战士们一样，深夜办公时也穿着单衣、身披线毯。后来，毛泽东指示工农革命军在桃寮和茨坪办起被服厂，解决官兵保暖问题。部队配发新棉衣当天，毛泽东拿着棉衣回到八角楼，送给房东谢槐福：“你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件棉衣，你就把这件棉衣穿上吧！”谢槐福见毛泽东身上也只穿着单衣不肯收下棉衣，后经毛泽东反复做工作才穿上了新棉衣。

井冈山上的困难，不只在生活方面。由于敌强我弱，一些人滋生出悲观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夜色深沉的山沟里，亮起了一盏灯，一灯如豆，群山静默。中国革命往何处去，毛泽东拿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深入分析中国革命实际，在八角楼微弱的灯光下写下《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破解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难题。此外，毛泽东还指明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指明方向。他满怀热情地描述中国革命的曙光，“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啊闪银光，井冈山的人哎抬头望，八角楼的灯光照耀四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虽然只有两年零四个月，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茅坪八角楼那微弱的油灯之光，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也点燃了中国革命艰苦奋斗的精神之火，也点燃了中国革命艰苦奋斗的精神之火，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宝。

（摘自2023年12月21日《中国国防报》）



一块见证光荣起义的手表

□ 邹文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块生产于20世纪40年代的手表。它的主人是指挥黄安舰起义的舰务官鞠庆珍。这块手表表盘直径3.5厘米，正面印有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与“国父”二字，银灰色的表链上略有锈迹。

1948年秋，青岛成为国民党在山东半岛的一座孤城。当时，国民党当局声称要“死守青岛”，实则暗地里做好了撤离南下的准备，黄安舰也接到了随队行动的命令。1949年1月，黄安舰奉命试航，为南撤做准备。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前期已潜伏在黄安舰上的鞠庆珍等起义骨干聚在一起，紧急制订起义计划，将起义时间定在2月12日，即

正月十五晚上。

12日，舰长被“动员”回家过节，舰上一半士兵放假登岸。天黑后，副舰长进舱睡觉，被起义骨干锁在舱内，70多名士兵被锁在底舱。随后，所有参加起义的人员在前舱集合；鞠庆珍宣布起义，并布置了具体任务。随即，黄安舰从青岛栈桥附近海域拔锚起航，按预定计划驶向连云港。

在鞠庆珍的指挥下，枪炮班班长孙露山、枪炮班班长王子良、枪炮官刘增厚及舵工张杰等起义骨干，迅速控制了副舰长室和通讯室，切断了黄安舰的对外联络。

就在黄安舰驶出几海里后，一艘美国军舰发来灯光信号询问：“你

们到哪里去？”起义官兵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鞠庆珍回答：“风浪太大，去竹岔岛避风。”就这样，他们从美国军舰旁巧妙驶过，向着解放区全速前进。13日凌晨，该舰顺利抵达连云港。

黄安舰起义后，国民党军出动飞机，对该舰进行轰炸，均未命中。同年8月，黄安舰前往青岛，加入人民海军行列，1950年初被命名为沈阳舰。

如今，这块见证光荣起义的手表早已停止转动，但它承载的人民海军初创时步履维艰的历史记忆，仍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

（摘自2023年4月16日《解放军报》）



鞠庆珍在指挥黄安舰起义时佩戴的手表

李克农：隐蔽战线 传奇将军

□ 鲍晓菁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芜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情报和保卫等特殊战线上工作，以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工作方法，屡建奇功，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誉为“传奇将军”。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0年，李克农调中央特科

工作，从此国民党CC组织的秘密经李克农小组有领导有计划地及时掌握。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克农参

与了苏区和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建设，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冬，李克农奉周恩来指示去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使我党在西南一带有了公开的代表机构和领导核心。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露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

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指导党的隐蔽战线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

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1年曾参加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曾任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代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于北京病逝。

（摘自201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旧居内陈列的油灯和著作单行本